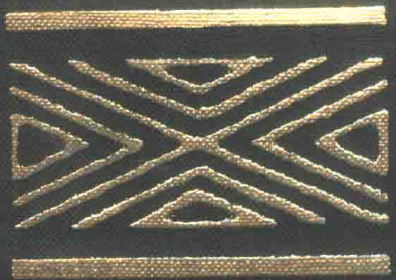




四川通志

1





四川通志

2





四川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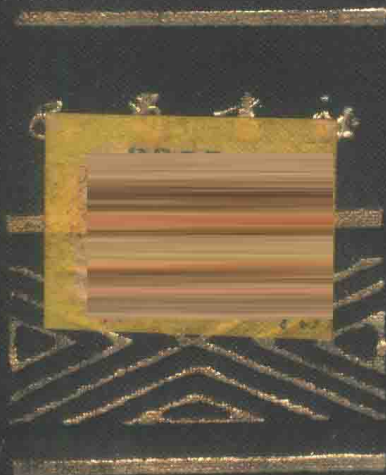
3





四川通志

4



清 常明 杨芳灿等纂修

四川通志

第一册

巴蜀書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四川通志

第二册

巴蜀書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四川通志

第三册

巴蜀書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四川通志

第四册

巴蜀書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四川通志

(精裝本全四冊)

巴蜀書社出版

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時代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一〇〇元

書號：一一三三一九·五

重印清嘉庆《四川通志》序

地方志向称方志，它是在一国版图内某一方域中所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千态万状事物发生发展的事实纪录；旧时图书分类，列入史部。现今学科分类，日趋严密，综合史、志考察，二者有同有异，亦各自有其学术范畴。但在我国古昔，诸子百家，著述纷繁，亦未能明辨及此。自司马迁《史记》立八书，班固《汉书》列十志，以后历代相沿，志遂成为史的组成部分，或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庸。由于历史渊源，左史右史，均属王官，虞夏商周之书，其事则尧舜禹汤文武、齐桓晋文，其作意则历叙古今治乱盛衰兴亡之迹，供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参考。自《尚书》、《春秋》以至号称历朝正史的廿五史，其撰修的总目的概不外此，史书之内容实有其局限。今试旁考三代典籍，举凡自然、社会千态万状的事物，诸如历象日月星辰、礼乐射御书数、地舆人口图籍、百工梓匠轮舆，以及鸟兽虫鱼草木之名，都各有专官，分门别类，各有纪录，是即今日所谓各种专志的滥觞。而在一个或大或小的行政区域，汇集方域内所有专志资料，纂成一书，于是即有方志。自有方志，而志书蔚然成为大国。志和史一纵一横，相辅相成，星月交辉，并翼发展，成为我国灿烂的文化宝藏。

以书、志、传、记、录、考、谱、状命名的专志与方志，汉代即已流传。魏晋至唐，续

有发展，至宋代而大盛。由于史官久废，私家著述为多，所志亦率限于州郡都邑，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亦仅粗具一国规模。元代疆域扩张，张皇威武，创修《大元一统志》，自是于国史外始有国志。明代继修《大明一统志》，成祖朱棣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又颁布《纂修志书凡例》，规定必须包罗二十八项指定类目。由是方志开始统由官修，十三布政使又首颁纂修行省志书，由是省有省志，例称总志。清代建统未久，康熙时即令全国修志。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又命天下督修直省通志，送上一统志馆。总志自是改称通志。又下令州县志书六十年修一次。当时全国各省治都设立修志局，由学政主管，成为方志全盛时代。自明代起，至一九四九年，我国各省、府、州、县、乡、镇地方志，据考计有八千七百多种，真是洋洋大观，世界各国无与伦比。

四川乃著述之林，自汉以来，史志即称先进。以专志、方志而言，西汉有扬雄《蜀纪》、《方言》；后汉李尤有《蜀记》，赵宁有《乡俗记》；蜀汉譙周有《三巴记》、《巴中异物志》，陈术有《益部耆旧传》；晋代陈寿续有《益部耆旧传》，常璩有《华阳国志》，孙盛有《蜀世谱》，袁休明有《巴蜀志》；南朝梁李膺有《益州记》，唐代段成式有《游蜀记》、《锦里新闻》，卢求有《成都记》，韦皋有《西南夷事状》、《西戎记》，李德裕有《西南备边录》，周茵有《阴平县记》，李仁实有《戎州记》，五代杜光庭有《续成都记》、《青城山甲记》，韦庄有《蜀程记》，僧仁显有《华阳记》，张彭有《锦里耆旧

传》；两宋时期，沈立有《蜀江志》、《剑南风物录》，赵卞有《成都古今集记》，王刚中有《续成都古今集记》，范成大有《成都古今丙记》，胡元质有《成都古今丁记》，宋祁有《益部方物略记》，石庆嗣有《梓潼风俗谱》，刘甲有《蜀人物志》，句台符有《岷山异事》，郭友直有《剑南广记》，张开有《峨眉志》。此仅略举类例。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地理志》部，所载蜀中方志，截至元初费著《元成都志》，即达一百二十四种。明清两代，四川府、厅、州、县普遍修志。省志在明代，至今尚有正德十三年戊寅（一五一八）、嘉靖二十年辛丑（一五四一）、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三种《四川总志》。清代于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刊行《四川总志》，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刊行雍正《四川通志》，嘉庆二十一年丙子（一八一六）刊行嘉庆《四川通志》。

自嘉庆二十二年至清王朝灭亡的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中经九十四年，四川未再续修通志。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四川省政府始设四川省通志局，聘宋育仁为总纂，重修《四川通志》。时值国势板荡，先以军阀混战，继以反共内战，直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二）始成初稿，终亦徒束高阁。但地方各县市修志，迄未中断。一九八二年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印《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计有四川地方志书七百九十二种，计明代二十一种，清代四百六十种，民国二百九十五种，解放后十六种。它与上述自汉以来志类合计，超过千种，成为研究我省自然、社会、区域沿革、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人物、风俗千态万状事物的运动生息所必不可少的最基本资料。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编修史志，成为新国家一重要课题。一九五六年，^国政务院设中国地方志小组，领导全国地方志的编纂。一九六〇年三月，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决议筹建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于六月一日正式成立，以省长任主任，广甄人选，组建机构。在工作进行中，首先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体察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研讨旧方志的优劣得失，一致认为在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必须编纂一部前人所未曾有、所未能有的《四川省志》，既正确纪录祖先辈劳动智慧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丰富果实，又为当前和今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提供资料线索并推动工作前进。计省级各部门、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专家、教授、学者，编内编外集中三百余人，按地理、工矿、农林水利、交通、财经、盐业、教育、文化艺术、医药卫生、文物、民族、宗教、人物分编十三种专志（分志），相当于几千年各自的总结。鸦片战争至建国，则就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纂一总卷。正热气腾腾试稿中，突来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动乱，省志成为「破旧」重点，图书资料稿本横被抄没，编纂人员横被迫害，甚至死亡，至一九六九年，省志机构亦被撤销，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开会，中央领导同志即号召继续编纂地方志。一九八一年八月，中国地方史

志协会在太原成立。同年十月，中共四川省委决议设置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继续纂修省志并指导全省各市、州、县修志。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
议，国务院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报告，亦提出编修地方志的任务。现在编修地方志已在全国各地展开。我省于去年十二月在温江召开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后，新拟定四十余种分志，有关部门正分工落实，市、州、县亦先后建立机构，从无到有，试行探索，出现一片新气象。我已九十髫龄，亦不能不欣然偶作小助。

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孔子，毕生全神贯注史志。他能言夏礼、殷礼、周礼，洞悉三代因革损益；他所删、定、赞、作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前人谓六经皆史，尽管遭到秦灰，犹为中国民族留下广博深厚的文化遗产。在近代，伟大导师列宁告诉青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共青团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更告诉我们：「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改造我们的学习》）号召大家「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整顿党的作风》）史志工作，何等重要！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者以兵舰大炮并利用传教士、考古家、探险家采取种种手段，掠夺、盗窃、骗取我国图书典籍，视为自己的财富。

一时西方好古敏求之士，不惮重译，深入发掘，恍然惊觉中国古籍具有西方文化从未有过的精英与科学技术的先进，著书立说，兴起汉学西流。亦有摇唇鼓舌之徒，不学无知，自种自大，拾我早经唾弃的糟粕，妄肆猜测诋毁，我们自须明辨是非，更宜深自鞭策。我国古籍流失，史志尤为严重。八千余种我国地方志，据传美国犹他州某家谱协会竟收藏五千余种，供人发掘。近来福建出版社从日本得到明代冯梦龙《寿宁待志》明末原刻本影印卷，浙江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得到清乾隆时《越中杂识》稿本影印卷，均经复印发行。中国人民必须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责任在身，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我们的方志。

历观我国记载，编修史志，自来即富优良传统。周官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外史内史分工负责且不论。汉武帝置太史，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司马氏世掌国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畅论六家要指。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承受父学，协调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始在纆继中撰成《史记》，又经博士褚先生补订，乃得最后完成。《汉书》修自班固，固父班彪即毕生专力史学，鉴于《史记》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即收集史料，作《后传》六十余篇。班固继承父学，纂成《汉书》，犹缺八表及《天文志》，由妹班昭完成，计先后经两代父子兄妹三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宋英宗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书笔墨缣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后

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位，不责职业。如此经过十九年，然后《资治通鉴》完成。明嘉靖时修《四川总志》，主编为陕西周至王元正、遂宁杨名、新都杨慎，三人均系谪贬犯官，共同担此大任，古今尚无他例。清代章学诚既创方志学，又亲自主持《和州志》、《永清志》、《亳州志》的编纂，又为毕沅指导湖广《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及大名、石首县志。同时戴震主编山西《汾州府志》，段玉裁主编四川《富顺县志》，李调元在直隶完成《函海》刻本，回乡又跋山涉水，亲修《罗江县志》，继后宋育仁又续修《富顺县志》，张森楷于校勘廿四史后，又纂《合川县志》，林思进亦续修《华阳县志》、《华阳人物志》。综上史实考察，我们可以见到：一、史志在中国几千年盘根错节，生气磅礴，来自不易，事非偶然；二、自昔即有专家学者，累世毕生，投绝大精力于史志，甚者不恤身殉，后世传为美德，成为撑拄史坛的一根红线；三、国史设馆，方志设局，机构清要，职位尊崇，因而人无滥竿，业有专守，时间不限以催科，质量务期于精当；四、官修特重人选，任人坚持唯贤，虽廷杖犯官，亦主持一省经勅修之通志；五、学术公开，但求至善，宋代既有刘昫《唐书》、薛居正《五代史》，欧阳修又两作重修，新书方成，吴缜又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至今六书并存，后世研究者庆得窥见全豹。凡此皆前代史志的宏观，允为后世的借鉴，若不重视历史经验，将难免道途迂回。

自清嘉庆末至建国前凡一百二十余年，四川省志，若存若亡，各府、州、县志虽方兴未

艾，作者早已飘零。今日史志宏开，顿须人才济济，无论首创何种模式，旧志仍须一加寻绎。惟现有二百一十余县市，尚有少数从无志书，史实茫然，工作兴叹。检阅古籍，具有包罗全省各地区自然、社会千态万状事物的纪录可供所有市、州、县参考借鉴的，莫过于清嘉庆《四川通志》。四川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因讨论由巴蜀书社影印发行，以应急需，并命我写一篇序。自惟离此工作已十八年，梦魂萦绕，何计绵薄，因就平昔对史志所感到的许多问题，不揣谫陋，不憚琐屑，略加述说。非敢为序，聊助商酌，所盼同俦，惠予匡正。

一九八四年九月，前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四川古籍整理学术委员会主任张秀熟谨序。